



上圖為張國焘晚年的照相

細說張國焘（六）

• 費雲文 •

生命遭受威脅 無奈棄

暗投明

抗戰開始，七月下旬，中共軍隊改編爲第八路軍，已經大致商擬定案，中共投誠國民政府，參加抗日戰爭之事，已成定局。國民政府曾經派一個軍政視察團到延安，瞭解狀況，溝通意見。毛澤東尚邀請張國焘參加接待座談，一致強調擁護蔣委員長，共赴國難，抗戰到底的誠意。

可是，當八月廿日左右在洛川召開的「中央擴大會議」上，毛澤東却支持張聞天根據「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」，所提出來的「中共在抗戰時的基本策略」：

「應該一箭雙鵠，使日本和蔣介石和一切反動勢力相繼失敗，最後勝利歸於勞苦工農大

得變更，在敵後各地所發展的抗日游擊根據地，也應該秉承延安的指示，自成體系。

在國民黨區域內的中共組織，除少數人可以露面外，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，展開對國民黨的政治批評，尤其要反對漢奸和妥協活動，爭取羣衆。」

張國焘聽到這番議論，不以爲然，立即發表相反言論，他以爲：

「抗日戰爭是民族自衛戰爭，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的爭霸戰，二者不能相提並論。現在既已經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，就不能再提出使蔣介石失敗的主張；祇有推動抗戰到底，影響他在內政上實施若干改革，求取進步。」

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，是使日本侵略失敗；抗日的全體中國人，不分黨派，都應獲得勝利。」

八路軍的內部體系，仍維持紅軍規模，不

(六) 蔡國張說細

接着，周恩來也對毛澤東的意見，有不同看法，他以為：

「中共應從積極抗戰中，提高其政治地位，過去說過與國民黨精誠合作，共謀抗戰勝利；今後，不可在事實上有表裏不一致的表現。」

八路軍不可公開違抗南京政府命令；但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國民政府的法令，而實際上保留自己的精神。戰法上，在有利情形之下，可與日軍進行較大規模的運動戰，即使蒙受較大損失，在所不惜；用以爭取民心。」

其他與會人員，或多或少的表示不能完全同意毛澤東與張聞天的意見；大體主張「應當委曲求全，爭取抗戰勝利」。

毛澤東看到形勢不利，提議休會三天，復會後，搞出一個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」，和一項「中共任務決議」，照前次會議張聞天和毛澤東的意見，加以增修，刪去「要使蔣介石失敗」、「中共八路軍應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下行事」等語句，增加「八路軍在極有利的條件下，才進行較大規模的運動戰」等字樣，通過結束。說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；實際上，毛澤東仍照他自己的主張行事。當八路軍開赴前線作戰時，他還是指示他們：「一分抗日，二分應付國民黨，七分發展壯大自己」的決策，並且要分以下三個階段來實施：

「第一階段：與國民黨妥協，以求生存發展；第二階段：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，而與之

相持；第三階段：深入華中各地，建立華中根據地，向國民黨反攻。」

毛澤東爲了表面上安撫張國燦，又提出請他辭。毛澤東、張聞天又保證凡邊區政府所管轄之事，無論對內對外，全由張國燦主持，黨決定支持他；再不讓同志們因爲過去的事批評他。並且以促進黨內的團結，應付抗戰局面等話題來打動他。他祇好應允。（國民政府發表該邊區政府主席爲林祖涵，副主席爲張國燦；林祖涵經常在西安，張國燦最初以副主席代理主席）。

可是，毛澤東、張聞天這一次對張國燦的好姿態，完全是虛偽的，實際上他們想辦法打擊張國燦，使他的「邊區政府主席」不能有任何作用；尤其防範他利用職權建立對外關係，不遺餘力。他們向外散佈謠言，誣指他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，過去「蘇區」一切壞事，都是他所作所爲；甚至八路軍遲不肯開赴前線，也是張國燦的部下不願抗日；儘量破壞他對外信譽，阻撓他與外人相見。

不久，負責指揮「西進計劃」部隊的陳昌浩潛赴延安。十一月中旬，「中共中央」召集中共延安積極會議檢討陳昌浩，又藉此掀起一場「反對張國燦」的鬥爭。

首先，毛澤東、張聞天指責張國燦在洛川會議上的發言，表示對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抱有右傾觀念，對蔣介石也有投降思想。接着，在張聞天領導控制之下，運用一般少不更事的黨員學

生，在連續一個星期的會議期間，以「土匪」、「軍閥」、「反黨」那一套帽子，集中攻擊張國燦和陳昌浩，似乎中共過去的一切錯誤，都是張國燦搞的。

最後一天，張國燦提出總答辯，以示抗議，曾經很沉痛的表示：

「同志們批評我的話，我不願多加答覆，僅指出幾點毫無事實根據的。我要請你們設身處地想想，你們將我痛罵得不成樣子，我這個邊區政府主席還能够做得下去嗎？在此抗日緊急關頭，你們沒有將時間用在準備抗日的工作上，卻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，在這裏大聲疾呼的圍剿我，究竟目的何在？」

那些受人指使的「鬥爭小將」，不但不受感動，反而更加狂妄的指責他「承認錯誤，不够徹底」，「沒有放下反抗武器」，進而謾罵：「張國燦同志是中共中央一個發亮的蒼蠅。」（會議主席張聞天不但不加制止，反而含笑欣賞，這使張國燦怒不可遏的立即離開會場。隨即表示辭去「邊區政府主席」職務）。

第二天，毛澤東又找他去談話，挽留他的辭職，並且解釋這次鬥爭，原是檢討西路軍失敗的經驗，不料又牽涉到兩個中央對立的事：請他不要介意。笑裏藏刀，張國燦啼笑皆非之下，祇好敷衍幾句，再不提辭職之事。

可是，事情並未就此罷休，毛澤東再暗中掌舵，支使他人對前往延安和張國燦團聚的太太楊子烈（共產黨員）和不滿十二歲的兒子，加以歧視和侮辱。使張國燦覺得他過去的聲望和爲人的

尊嚴，都已蕩然無存。極端失望之餘，他于十一月間，就有計劃的將「邊區政府主席」的職責，

推交祕書長潘自力代理。潘調走後，逐漸轉移到任修權身上。

正當他灰心喪志，為脫走暗作準備之下，却來了一件新的刺激；留在蘇俄的王明、陳雲、康生，乘坐一架飛機，于民國廿六（一九三七）年十二月下旬某日由莫斯科來到延安。

次日，即舉行「中共中央政治局」會議，首先由王明以史達林特使的神氣，發表長篇演說，闡述莫斯科對於實施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的新解釋解爲：

「中國抗戰的成敗，具有國際的重要意義

。如果中國能够充分發揮抗戰力量，給日本

以長期有力的抵抗，這將使日本無力向蘇聯進攻，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大大有利。

此次國共合作，應力求其穩固與久遠，彼此互讓互助。中共既是主動與國民黨要好，就要拋棄已往國共間的仇恨。

中共不應再自視爲無產階級的政黨，而應

爲代表中國人民的政黨；不僅代表無產階級

利益，也代表所有人民和全中國民族的利益

。這種放棄階級觀念的進取精神，也是共產國際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後，要求各國共產黨，在反法西斯帝的人民陣線中，所應持的態度。

至於國共之間爭奪政權的問題，那是將來的事，中共應主動的把這個問題，推到抗戰

勝利以後去。」

王明這番話，大出人想像之外，毛澤東受到

當頭棒喝，非常尷尬。張國燾雖然覺得此一見解

，要比毛澤東「一面聯合，一面鬥爭」高明一些

；但仍然沒有澄清將來中國可以走民主化道路，仍祇是爲了莫斯科需要中國拖住日本的一種權宜策略而已。

然而，事實還有更出人想像之外的事，王明居然指責張國燾是「托洛斯基派」（簡稱托派），他之所以在毛兒蓋與毛澤東等鬧意見，成立第二個「中共中央」，是受到「托派」的指使；並且對張說明此次經過新疆時，已經處決了李特、黃超、俞秀松、周達文、董示湘等「托派份子」了。

這使張國燾大受刺激，李特等人，是他的部下或友人，絕非「托派」份子。王明竟以揣摩史達林清除「托派」的意向，不讓辯白的擅自將他們謀殺，還要向他威嚇誣栽，那麼，他自己未來的處境，可以想像得知。至此，他覺得中共的一切事，都已超過了講理的範圍，也無法申訴，而且也無申訴的必要。

公開發發表言論 指斥中共 政治路線錯誤

當然，張國燾未便就此沉默，乃于是年五月廿日發表「敬告國人書」，除了駁斥「中共中央」對他的指責，說明他本人「擁護政府抗日，貢獻一切，爲國家民族効力」的立場外，並對「中共中央」政治路線的錯誤，加以指明；他說：

「第一：中國革命的性質，是全民性的國民革命，任務是內求統一，外求獨立；而就革命動力而言，城市市民與鄉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，都佔極大數量。這些階層對外積極反對侵略，對內並不代表統一的封建勢力；與近代共產主義思想毫無共同之處。另一方面，整個共產國際也完全變質了，它早已脫離從馬克斯以來歐洲工人運動的軌跡，而變質爲史達林式的獨裁，恐怖主義。」

於是，張國燾于民國廿七（一九三八）年四月四日，利用代表「邊區政府」前往陝西中部縣

參加祭奠黃陵大典的機會，脫離中共，隨同政府派往主祭的西安綏靖主任蔣鼎文，前往漢口，歸依我中央政府。

周恩來、王明、秦邦憲正在漢口，知道此事，曾當面阻撓他脫離中共，沒有結果。於是，「中共中央」與共產國際相繼宣佈開除他的黨籍；並發表指責他的文字。指責他：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信任，對中國革命表示絕望，進行破壞，並對抗國團結」等等。

有循着蘇聯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徑。更錯誤的是不瞭解革命客觀形勢，而採用諸多錯誤政策，客觀上對於可能參加的廣大革命力量，竟予以過當的摧折。

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對內統一運動，其目的原為反對封建割據，亦係形成全民對外之先決條件，應當確認其為進步的革命步驟。中共昧於正義，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，勉強予以聯繫，處處以階級利益抹煞民族利益。

第二：中共對中國國民黨之認識，亦極不正確。中共初則認為國民黨只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階級利益，繼又認為國民黨為法西斯主義之分派，國民政府為親日政府。但就三民主義的本質言，就國民黨的組成成份而言，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之過去政策而言，此諸估計非事實。

中國國民黨繼承中國革命之優良傳統，它推翻滿清專制政府，創立中華民國，北伐後逐漸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，迄今尚擔負著神聖抗戰建國的重任。即以此次抗戰而論，舉國上下，一致奮起，為中國歷史上所僅見。將士犧牲在五十萬人以上，尤復再接再厲。此諸明顯事實，無論何人，均不得不承認。此為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，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揚之實例。

蔣先生為舉國一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，當此國本飄搖，千鈞一髮之際，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責，忠誠謀國，中外同欽；凡我國

人，均不應藉口某些枝節問題，吹毛求疵，別謀發展，以快私圖。

所以，那些認為「國民黨具有兩面性，在目前抗戰是革命的，抗戰勝利後是不革命」的謬誤觀點，不僅否認由抗戰勝利而展開之偉大工作，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。

第三：中共策略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，即為不顧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，而爭取領導權的鬥爭。十年以來，現已證明「蘇維埃」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。就中共本身組織言，它久已退出產業區域，走向偏遠地帶，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，它已起了質的變化，已不是無產階級的政黨。但却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，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。

第四：中共主張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，在形式上改編紅軍，取消「蘇維埃」政權，停止土地革命，表示服從中央政令。但實際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，嚴格維護其小組織的利益，因而減弱現階段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。

吾人近來習聞中共宣傳，有所謂「共同領導、共同負責」、「共同綱領」等說話，仍不免是一種爭取領導權之陳舊思想，毫無放光。吾人近來習聞中共宣傳，有所謂「共同領導、共同負責」、「共同綱領」等說話，仍

段。據中共之意見，所謂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，諸凡與其意見相左之抗日分子，皆放在「統一戰線」之外，而一律打倒；所謂合作，凡中央政府管轄之地，皆在其作誤謬宣傳；而陝北邊區，則視外人租界封鎖尤嚴。如此作法，豈以為人盡可欺耶？」張國憲根據以上分析，又以抗戰建國的基本觀點，作出下列建議，他說：

「第一：中共同人，只有在確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之原則下，真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，毫無保留的實行三民主義，務必言行合一，不得再作與此相反的宣傳和組織。」

第二：無論任何情況之下，國民政權和軍隊應完全統一。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「抗日聯軍」之成見，使八路軍國軍化。邊區

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，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，更不宜自定法律，深閑固拒，排除異己，效法軍閥割據。總之，邊區政府現已無存在之必要，應即還政中央，以昭大信於天下；在中共所領導之游擊區域，亦應秉命令，充份發揮其抗戰作用。

第三：一致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，從事實踐中央之外交政策。」

天倫福蔭
劫後心灰意懶 晚享

保存實力，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，以徐圖發展，乃其真正目的之所

在，抗戰合作，不過為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

張國燦抵達武漢，由蔣鼎文陪同他晉見蔣委員長，蔣委員長除了派戴笠照顧他的生活，保護他的安全，並令陳立夫與他長談，詢問他今後願意做何工作？他堅決表示不能擔任黨政方面任何職務，祇希望政府暗中支持他辦一定期的民營刊物。正在籌商中，因武漢戰局危急政府準備遷往重慶而無結果。

當時，廣西當局曾歡迎他去遊覽定居。可是，當他應邀前往桂林時，廣西建設廳長黃公度（共黨份子），却在所辦的「建設雜誌」上，將共產國際開除張國燦黨籍的決議案全文刊出，有意戲弄譏嘲。他祇好立即前往重慶。

他到重慶以後，國民黨曾安排他為組織部的設計委員，並推舉他擔任國民參政會第三、四屆參政員，以清高的身份立場，子聞國事。但他因為中共的周恩來、王明、吳玉章也是國民參政員，他懶得與他們相見，所以他很少出席參加會議，抗戰團結等事實。

因為他是江西人，所以抗戰末期，政府又安排他為江西省臨時省議會議員。戰後，任命他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。可是，他兼任不滿兩月，却在參加一次省務會議，討論建設廳擬訂的修整全省公路計劃時，他反對「義務徵工」，主張按工計酬，如果省府無此經費，可由救濟總署撥款濟助。省主席王陵基和建設廳長以為修建公益事項而「義務徵工」，是已經通行無阻的法令，如此次破例意外給酬，則此後其他

事項，難乎為繼，所以未曾接納他這自問出自懲的建議。但言詞之間，有譏諷他係延安來投之人，不明法令之意。於是，他憤然辭職，前往上海，籌辦「創進」雜誌。

大陸淪陷，張國燦先來台灣，然後赴香港，與顧孟餘等創立「民主戰鬥同盟」政團，創刊「中國之聲」雜誌，由張任社長，「戰盟」的宣傳部長李微塵為主編，生活費用由「戰盟」支付。

可是，籌辦不久，他又因為不能與李微塵相處，而辭去社長職務。

當時，韓戰已起，國際金價上漲。他為維持今後生活打基礎，特地將他僅存的五千元美金，投入炒金市場，專門資漲；結果，全軍覆沒，一貧如洗。幸虧他長子海威在香港「聖士提反學校」擔任數學教師，待遇很好，才得維持一家簡易的生活。

後來，他接受美國肯薩斯（Kansas）大學的邀請，撰寫「張國燦回憶錄」，窮四年之力，完成百萬言巨著。從此，依靠此書版稅，維持生計。

國民黨仁至義盡 歷史 殷鑑垂久遠

張國燦的一生，已如上述。

有人以為張國燦脫離中共來投以後，國民黨未能善加運用，利用他在中共的身份地位，轉來分化中共，打擊中共，甚至有人主張幫助他重建共黨，通過決議認真國共合作，努力抗戰，執行國際統戰策略，取得史達林信任，付予半個或一個淪陷省主席的地位，付予某戰區副司令長官或某特區司令長官的職務，配備三、五萬人的兵力，指揮新四軍和他的舊部以及一些敵後武力；使他在黨、政、軍各方面的勢力和聲望，超過毛澤東，在國民黨的大力支持下，把毛澤東搞垮。

那麼，沒有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，與國民黨共同自行照料生活。

當他滿八十二歲的那天，海威特地接他來家，團聚祝壽。當他知道台灣十項建設成功，又進行十二項建設時，表示欣慰；對於大陸上「祇有當權老幹部享受特權，一般人民普遍饑餓，沒有自由可言；四個現代化，成為四個空話」的情形，憤怒的指責：「毛潤之（澤東）這個魔王死後還是遺害無窮，他必遺臭萬年。」

民國六十八（一九七九）年十一月三日，多倫多大雪不止，天氣奇寒。張國燦睡在窄狹的病床上，轉身時，覆蓋的毛毯掉落床下，他自己因為中風，無法拾起蓋好，叫人不應，竟自下午五時起，大吐大嘔兩小時，不治去世。

他的太太在香港時，已經因跌交跛了一腿，申請住入免費的老人病院；他太太也遷入養老院

抗戰、建國，中國人民是可以容忍的。

此說殊有問題。

先就張國燦本人說，當他來歸之初，就曾對陳立夫堅決表示不願擔任任何黨政工作。同時，在他當時公開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以及最後的回憶錄裏，也祇指責中共進行政治路線的錯誤，痛恨史達林排除異己的殘酷鬥爭手段，反對毛澤東、張聞天等人的陰險狡詐的伎倆；而不是從根本上反對馬列共產主義，更對中共有像親生兒子樣的感情。甚至他還說過：「中國共產主義者，無論在一起或暫時分離，總是背靠背在作戰。我們有爭執，但也相互依存；我們主要的努力，也始終是對付敵人；任何時候，也不會因內爭而忽略了對外」。因此，任何欲利用張國燦來分化、瓦解中共的想法，是不切實際的。

再就中共的組織說：中共自民國十年發展到抗戰期間，由赤手空拳到有武裝部隊，慢慢壯大，並非僅靠一人之力；同時，還要受到共產國際的控制影響。何況，張國燦來歸之初，即已公開宣佈脫離中共，不再是黨員；並無欲藉外力，與毛澤東從事奪權鬥爭，捲土重來之意。「中共中央」和共產國際也已先後開除他的黨籍；中國國民黨如何能支援已經失勢的他重建中共組織，把延安的「中共中央」搶過來？

張國燦原有重新入主「中共中央」的機會，那是在川西毛兒蓋與毛澤東會合之時。當時他有「以大吃小」的實力，和足夠指責毛澤東的理由；但他却以「黨內團結」的胸襟，對心懷叵測的毛澤東，忍耐禮讓。等到毛澤東瞞着他先行率隊

北上之後，他才感到受了詐騙，又迫於陳昌浩等部下的激憤，另立「中央」。不但未能從實質上得到「中央」的實權，反而留此話柄，成爲以後毛澤東發動黨羽一再鬥爭他的武器。

再就共產國際說：自國共第一次合作起，張國燦即不大滿意共產國際不切實際的干預中共的行動，當他在莫斯科親眼看見史達林整肅布哈林等高級幹部的冷酷無情，早已警戒在心。而史達林對他的個性強，不肯俯首貼面的唯命是從，早有怨感。何況，此次張國燦其所以毅然脫離中共的動機之一，就是王明打着史達林的旗號，指責他是「托派」份子；就是害怕被殘害！因此，要讓已經宣佈脫離中共的張國燦，再以忠於執行國際統戰策略，來爭取史達林的信任，取得中共正統地位，這是不可能的。

再就軍政方面說：司令長官、省主席是統治某一方面的軍政大員，負有指揮全面作戰和治理地方的重大責任；必須在黨、政、軍各方面有相當的淵源關係，在軍事上會有戰績威望，在地方上會有政績聲譽，還有其本人也要有高深的資望和卓越的能力，始克勝任。張國燦雖說曾爲中共的首領之一，曾爲「邊區政府」的主席，（實際上祇相當一省的行政督察專員）但與我黨、政、軍素無淵源關係，殊難在各方面收到密切配合，互相諒解的助力。過去的游擊戰鬥，是一種叛亂的行動，談不上戰績威望，土改鬥爭，不但談不上政績，而且遺恨在民；何況他並未學過軍事，如何指揮大軍作戰？並無行政經驗，如何協調各方，圓滿施政？政府如質然畀以方面重任，如何

服衆？他又如何能負擔得起？至於由政府下令將

新四軍及張國燦過去的舊部，撥歸張國燦指揮，也有問題。新四軍在江南自成系統，與張並無淵源，張的舊部，已編入八路軍，分散到各師，進入山西、河北敵後；何況，共軍的行動，並不是

指揮官一人所能決定的，而受制於政委。如無政委，指揮官的命令無效。師以下的團、營、連級都有政治指導員，也和政委一樣的施行職權，

層層節制。而政委、政治指導員則聽命於中共黨委會，所謂「黨指揮槍」。因此，不管政府給張

如何名義，中共也不可能在政府的一紙命令之下，指揮官一人所能決定的，而受制於政委。如無政

委，指揮官的命令無效。師以下的團、營、連級都有政治指導員，也和政委一樣的施行職權，

，但他却一反過去激於義憤勇於發言的作風，而瞻顧前後，「明哲保身」的未能盡言責，無形中放棄此一隨份報國的大好機會。

第三項工作，是以社會清望的身份，從事救濟慈善事業。政府于抗戰勝利以後，曾任命他爲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，讓他有服務桑梓的機會。救總爲美援機構，經費充裕，政治上的牽制較少，本可放手辦事。可是他又因爲一件普通案件的不同意見，和人家對他幾句閒言閒語，一怒掛冠，短短的幾個月時間，竟然透支法幣四億元之多。政府也因爲他係首先投誠來歸的中共首領，未予追究。

當他在台灣的時節，因爲頂房子上了房主的當，受了點閒氣，又一怒遷往香港，生活並不如意。先總統蔣公對他相當關切，曾經數度向他有交誼的蔡孟堅詢問，並且還指示最好通知他來台灣定居，免得飄萍在外。當他在加拿大倫多老人病院養病時，我政府當局還特地贈送給他一筆醫藥費。此事距離他投誠來歸已經四十一個年頭，由此可見國民黨對他，可謂仁至義盡了。

根據以上敘述，可知國民黨並未薄待張國燦，也沒有「未予善加運用」的失策。而張本人對國民黨往往有一種：「我在國民黨人眼中，是身家不清白的人喲！」的自我猜疑；同時，多年來的努力，仍不能多所理解，仍然具有偏頗的成見。當他的「回憶錄」于民國五十四（一九六五）年出版問世時，他的太太楊子烈有一篇「張國燦先生的略歷」，曾經有如下的話題：

「抗日戰爭期間，張先生曾任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，表示與國人一致抗日之至誠。此後張先生對國內外政事，日益置身事外。拿他自己的話來說：『我的激進思想與愛國熱忱，一如往昔，但願遠離這種或那種獨裁專政』！」

已經是民國五十四（一九六五）年了，仍然不分好歹不明是非的把別人都看成「獨裁專政」；太令人遺憾了。

總之，張國燦是一個富有愛國熱忱，有堅強個性、能說能幹、勤勞刻苦的革命份子。可惜他走錯了路，在共產黨的思想與行動中，他本來具有儒家相忍求全的優點，變成被排斥鬥爭的缺點；他的秉性忠厚，難敵毛澤東的陰毒險詐。他太

被囚禁，人亡家破，絕了後代；而且還要遭到鞭屍，遺臭萬年。

歷史是面明鏡，當我們明瞭張國燦一生的遭遇，和這幾十年來的時事變遷，怎不令人感慨萬千。

（全文完）

台北市稅捐稽徵處公告

70311北市稽二甲字第一二七五六號

主旨：公告本市六十九年下期地價稅開徵日期及有關事項。
依據：土地稅法第四十三條。

公告事項：

- 一、繳納期限自七十年三月十六日至七十年四月十四日。
- 二、辦理納稅儲蓄戶稅單送由銀行轉帳，其餘按址派員或郵寄送達，如有未收到稅單或接到稅單後遺失者，請於繳納期限內向所在地稅捐分處申請補發。
- 三、稅額計算方法及收款公庫名稱、地點詳於地價稅稅單內。
- 四、稅單記載事項，如認有不符，請在繳納期間內向所在地稅捐分處洽詢查對更正。
- 五、敬請本市各納稅義務人依限繳納，逾期繳納者依規定每逾二日須照應徵稅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，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，移送法院強制執行。

太陽子烈曾經批評他：「國燦滿腦子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。實在不配作共產黨徒啦！」幸而，他看到形勢不利，能斷然放下他多年草創奮鬥的事業，棄暗投明，才免於日後可能像劉奇少樣的慘遭橫死；而且還能享受天倫之樂，在兒輩的照顧之下，安靜的活到八十二歲的高齡。

另一方面，作惡多端，禍害國家的毛澤東，雖然也活到八十二歲，可是一旦亡故，不但妻子被囚禁，人亡家破，絕了後代；而且還要遭到鞭屍，遺臭萬年。